



泉州古代科举

泉州古代科举

陈笃彬
苏黎明 著

◆ 齊魯書社



陈笃彬 苏黎明 著

泉州古代科举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泉州古代科举 / 陈笃彬, 苏黎明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4.9

ISBN 7-5333-1384-4

I. 泉... II. ①陈... ②苏... III. 科举制度—历史—泉州市—唐代~清代 IV. D69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63370 号

泉州古代科举

陈笃彬 苏黎明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E - mail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32 开

印 张 10.5

插 页 2

字 数 244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33-1384-4/K·413

定价:26.00 元

序

刘海峰

科举，已是一种离我们越来越遥远的古代考试制度。然而，科举逝去百年之后，中国人对它却并不感到陌生，中国古代的各种制度很少有像科举这样至今还为一般中国人所知晓的。

不过，科举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却颇为异样和复杂。一提起科举，广大青少年便会想起中学课本中学过的《范进中举》一文，想起那科举制度下可怜的读书人和考中后令人喜极而疯的戏剧性情节，认为科举是一种压抑摧残人才的腐朽制度。而乡间老百姓从传统戏剧和民间故事中，虽也知道《秦香莲》中忘恩负义的状元郎陈世美，但对古时候“私定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之类的才子佳人故事印象却并不坏。一个落魄书生穷小子，通过发愤苦读而出人头地，就可能金榜题名后衣锦还乡，娶到所爱，或者甚至考中状元招为駙马，确实令人扬眉吐气。在他们看来，科举是一种可以让人经过奋斗而改变命运的东西，且乡里族谱上祖上出过举人和进士也是一种光荣，谈不上有什么不好。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人文教育活动的首要内容，科举与古代读书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在中国历史上，可能再也找不出其他任何一种制度曾经如此深刻地影响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人生前途和生活态度了。1300年间，科举及第、金榜题名几乎成了所有读书人都梦寐以求的理想，很少有读书人完全不为科名所动所累、从未参加过科举考试的。因此，围绕科举的备考、赶考、

待榜等等活动成为多数读书人经历过的科举生涯。而且,科举不单单是士阶层的大事,也是一个地方、一个家族的大事,到后来甚至演变成为一种几近全民动员的盛大活动,因而不仅与一地的政治、教育、文化等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对民俗民风和社会心理等各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

泉州是一个文明古地,也是一个科第繁盛之乡。从唐代的欧阳詹开始,历代进士层出不穷。甚至在兵荒马乱的五代十国时期,泉州都还举办过独立的科举考试。据《宋史·漳泉留氏世家》载,南唐时清源节度使留从效在其统辖的范围内,“每岁取进士、明经,谓之秋堂”。虽然具体如何考取不知其详,但在一个不太大的辖区内独自举办科举考试是相当特别的。到了宋代,泉州与整个福建一样,进入一个科举的兴盛时代,人才辈出,这在本书中有详细的描述。元代泉州科举中落,我在为老家《圭峰文化研究》第4辑所作的序文中,曾提到元代福建实有可考姓名的进士仅36名,而元至正二年(1342年)及第的我乡惠安(今泉港区)峰尾人卢琦是元代泉州唯一著名的进士(另有一名南安县吕大奎较不知名)。但到明代,泉州科举又再造辉煌,科甲联翩,直至清末仍承其余绪,流风不绝。1300年间,泉州流传下来许多科名佳话。科举好像一个通向人间天堂的考试地狱,许多人刻苦攻读,终于通过科举出人头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为家族和地方争得了荣誉。在科举时代,科名以人重,人也以科名重,科第人物是隋唐至清末政治和文化人才的主力,泉州历史上的多数名人也是进士出身。因此至今往往还为地方人士所津津乐道,研究地方史和地方文化的人士从来都热中于本地的科名。陈笃彬院长和苏黎明教授在出版《泉州古代书院》之后,又接续完成了其姐妹篇《泉州古代科举》,实在可喜可贺。

研究一个地方的科举，必然会涉及科举人物的地理分布。我在《福建教育史》一书中，曾花了大量的精力专门统计过全省各地历代科名的消长。《泉州古代科举》对科名的地理分布，更详细统计到县一级。明清时期，中国各省区科名盛衰表现出沿海与内地之间的明显差异，福建省各地的科名盛衰也表现出沿海州县与山区州县的落差。泉州是一个沿海地区，但从本书的统计分析来看，甚至在泉州境内，也存在沿海县与内陆县科名的巨大差距，这与沿海县份人口较多有关，更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教育水平密切相关。可以说明清时期泉州各县科名的地理分布状况是福建省和全中国科名地理分布的一个缩影。本书在叙述泉州科举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又总结各朝代泉州科举的特点，分析士子对举业的态度等。在全书最后，还对科举制社会影响的各个方面，如科举对泉州古代读书人的影响及对泉州古代教育、文化、政治、民风、民俗、社会形象的影响等皆作了概括，多有道理。如作者认为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中，影响泉州社会形象的因素固然不少，但科举却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要素。这些都是本书的可贵方面。所应注意者，向来地方志对当地科名偏于夸大，尤其是关于唐代进士的记载有许多不实的成分，我们在看待有关唐代泉州的进士时，也需作如是观。

“科举学”的广博性，充分体现在科举制的影响无远不屈，再偏僻的县份也多少会有考上进士或至少会有考上举人者。每一本地方志都可以找到记载当地科名的内容，每一本族谱都有关于祖先科名的记录。因此科举学是一门与中国几乎所有地方和所有家族有关的专学。例如，在我的峰尾老家大门上还有清代进士刘章天写的“回澜”二字石刻，祖屋大门顶还挂有“进士”牌匾（大概是武进士）。科举学具有巨大的研究空间，历史上留下的科

举文献远较书院的记载更多，现在已有不少地方出版了当地科举或状元、进士的专书，本书的出版必将为科举学踵事增华，也可为乡人了解乡土文化提供一本很好的著作。得知关于泉州书院与科举二书，还是陈笃彬院长在听我主讲的“中国高等教育史”博士生课程时萌动的写作念头，令人欣悦，是故乐以为序。

2004年4月30日

引言

从唐代至清代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如果说有什么事能长期引起泉州社会各界普遍的浓厚兴趣，那么，科举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之一；当代的泉州人，如果说对古代泉州社会依然有一些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科举无疑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之一。

科举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主要的一种人才选拔与官吏选拔制度。科举制度诞生于隋朝，这个短命的封建王朝，两代帝王的政绩并不显著，但在建立科举制度上却有历史性的贡献。隋文帝废除历代从世家贵族选士的旧办法，改为考选秀才。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始建进士科。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发轫。科举制度通过考试的形式，实行分科考试的办法，以考秀才、考举人和考状元这种层层考试的方式，不断进行淘汰，并辅之以严明的科场规矩，按照考生成绩优劣决定录用与否，以及任命品位的高低。从人才学的角度看，科举程序具有相当科学的成分，它始终遵循一个“平等竞争”的信条，这就是“学而优则仕”的统一标准。因而，它一直为隋代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所采用，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代，直到1905年，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的漫漫长路，为封建国家贡献了几十万各类官员。中国人的这一创举，不仅在中国教育史、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得到西方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充分肯定，早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成为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

自科举制度推行直至唐代中叶,泉州一直与科举无缘。造成这种状况的客观因素在于泉州社会经济不发达,文化教育落后,且僻在东南,距京城长安路途遥远,信息不灵。这些因素反映在主观上,则是对举业信心不足,也未能引起足够重视。所谓耽于“山水禽鱼之乐”,实质上不过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罢了。无论怎么说,一个并不算很小的州,在一百八十年间一直与科名沾不上边,只是充当看客的角色,毕竟是颇为尴尬的事,遭到中原人的嘲笑与轻蔑,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唐以后,泉州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进步,为举业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尤其一些地方官员的积极鼓动与扶持,泉州人的科举热情与信心逐渐被激发起来,开始把自己优秀的子弟推向科场竞争的舞台。以欧阳詹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子,千里迢迢奔赴长安应试,不负父老乡亲的殷切期望,初试锋芒即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唐五代泉州的科第人物尽管数量不多,在全国的影响也相当有限,然而对于泉州社会的影响却巨大且深刻。

宋代是泉州科举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入宋以后,泉州经济地位迅速上升,尤其是南宋时期,一跃成为东方大港,经济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之而来的是文化教育的蓬勃发展,出现了“家诗书而户弦诵”的局面。科举制度在泉州已深入人心,社会对举业的热情持续高涨,追求科名成为一种风尚,举业因而具有更为有利的社会环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终宋一代,泉州进士人数达到一千四百多人,不仅位居福建各府州较前列,且在全国也占有一定地位。这期间,开始出现一个家庭或家族先后有多人登第的空前盛况,形成了所谓的科第世家。而且,涌现出一大批在各方面卓有成就的科第人物,如状元曾从龙、梁克家,政治家曾公亮、吕惠卿,科学家苏颂等,都是当时在全国有相当影响的人物。可谓群哲嗣兴,冠裳纓绂,科甲蝉联,群星璀璨。借助

这些著名的科第人物,泉州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在全国的影响迅速增大。所谓“海滨邹鲁”的美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

元代是泉州科举的中落时期。导致这一局面的不仅在于元王朝的短命,更在于元王朝对科举并不重视,开科次数及录取名额均大为减少,又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泉州社会对举业的热情因之大大降低。加上宋末元初争夺泉州港的斗争,以及元末延续时间不短的“亦思巴妥”兵乱,严重削弱了泉州的科举基础。所以,元代泉州的举业在经历了宋代的高峰之后,步入了一个极为低落的时期,在这九十多年时间内,登科榜者寥寥,除卢琦之外,也没有产生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科第人物,对当时和后代的泉州社会也没有留下多大的影响。

明代是泉州科举的第二个高峰时期。明代泉州举业的再度辉煌,主要得益于明王朝对科举的高度重视,刺激了泉州社会各界对举业的热情,适应举业发展所需的各种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教育事业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且对科举的研究也应运而生,出现了一批在全国有相当影响的科举指导读物,举业再次获得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具有较好的基础条件。因此,在经历了元代的中落之后,举业再次达到一个新的高峰,成就不仅可与宋代相媲美,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宋代,出现过“一科两元五十八举人”,“一时六相九尚书”的盛况。明代的泉州,不仅进士数和举人数在福建占有很大比例,进一步跃居福建各府州前列,且取得状元、榜眼、探花等高科名的人数,也位居福建各府州前茅。伴随着举业再度兴盛而来的,是一大批新的科第家族的涌现。同时,在这些科第人物中,又有相当一些在全国颇有知名度的人物。可以说,明代是泉州科举最为风光的时期,故有所谓“人文之盛,甲于闽省”之说。

清代是泉州科举的逐渐衰颓时期。经历了明代的再度辉煌之后,清代泉州的举业呈现出较为复杂的状况。一方面,仍然有着颇为可观的绩效,举人数与进士数仍然位居福建各府州前列,基本保持了科举强府的地位。另一方面,举业出现了明显的颓势,倘若与明代相比较,成就已不那么耀眼。颓势从清代后期开始,严格地说是从乾隆中期开始显现出来。耐人寻味的是,这个时候,科举制度历经了长达千年的运转之后,已是弊端百出,正一步步走向末路,寿终正寝之日已为期不远。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泉州的举业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虽与福建一些府州比较仍可聊以自慰,但与位居最前列的福州相比,清代前期泉州的优势不仅不复存在,且差距愈来愈大。直至清末废科举,这种颓势始终未能再得以扭转。

千年科举,泉州人取得了不凡的业绩。从唐贞元八年欧阳詹登进士榜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废科举,前后一千一百余年,泉州共有进士二千四百五十四人,其中文进士一千八百零八人,特奏名进士四百九十二人,武进士一百五十四人,数量上长期居全省各府州前列。不仅登科中举者人数众多,且各种人才济济。历代进士中,文状元六人,即五代的陈邕、黄仁颖,宋代的梁克家、曾从龙,明代的庄际昌,清代的吴鲁。武状元二人,即明代的庄安世,清代的黄培松。榜眼有欧阳詹等十八人。探花有杨葆中等六人。同时,出现了不少兄弟进士,父子进士,祖孙进士,祖孙三代进士,四代进士,形成不少书香门第,簪缨之族。历代进士中,有一大批颇有建树的人物,突出者如政治家曾公亮、梁克家、李廷机、陈庆镛,政治改革家吕惠卿,理学家蔡清、张岳、李光地,抗倭名将俞大猷,文学家欧阳詹、王慎中,史学家吕夏卿、何乔远,书法家张瑞图等。可以说,泉州历史上的著名人物,绝大多数都是科举出身。

千年科举,曾给许多泉州人带来希望与欢乐。科举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是能否步入仕途的一大关隘,是人生荣辱的分野,是出人头地的界碑。一旦金榜题名,个人身价倍增,命运从此改变,家族与乡里也跟着沾光。因此,它具有毋庸置疑的魅力。人们把它当作理想世界的最高主宰,当作心灵王国的奇异灵光,热烈而执着地追求,梦寐以求摘取那甜蜜的希望之果。一代又一代,科举不仅给许多泉州人带来播种时的满腔希望,带来充满激情的期待,也给他们带来了收获时的喜悦,带来功成名就的欢乐。那些科场的精英们,凭着自身的智慧,经过顽强的搏击,终于脱颖而出,成为时代的幸运儿。梦想成真,是何等快乐;风骚独领,又是何等荣光。正如唐人孟郊《登科后》诗中所描述的那样:“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在这种欢乐之中,一切付出得到了最大的酬报,一切艰辛得到了最大的慰藉。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也在分享着这种激动与喜悦,为幸运者们的激动而激动,为他们的快乐而快乐。

千年科举,也曾给许多泉州人留下遗憾与苦涩。对于古代泉州众多的读书人来说,科举所带来的失望与苦涩,或许要远远大于它所带来的欢乐。这种失望与苦涩,正源自于强烈的希望。登科中举多么荣耀,多么吸引人,于是就有强烈的企盼,就有痴心的追求。但是,希望越强烈,失望的打击就越大。科举毕竟是条狭窄的小道,是个淘汰率极高的行当,虽然人人可以参加,幸运儿永远只是极少数,考个秀才尚且不容易,何况考上举人或进士。综观泉州千年科举史,无数读书人曾为科名二字苦苦追求,“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所有热切的希望换来的总是不断的失望,所有美妙的期待得到的总是一再的落空,目标永远是目标,可望而不可及。当理想成为奢想,当憧憬成为无望的幻想时,曾经有过多少难以名状的酸

涩，多少无可奈何的叹息，多少寂寥落寞的伤感，多少刻骨铭心的苦痛。那一幕幕苍凉凄清的画卷，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扼腕。

千年科举，无论希望失望欢乐痛苦，毕竟给古代泉州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它以其独具的内涵，特有的魅力，牵动着古代泉州社会各界的心灵。从繁华的商埠，到僻远的乡壤，无论是贵族官吏、富商巨贾，还是平民百姓、村夫农子，无不深受其触动。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教育、文化、政治、经济，以至社会价值取向、风俗习惯，无不深受其影响。它渗入官吏的政绩追求，改变了教育的发展，丰富了文化的积淀，塑造了社会的价值取向，导致了一些风俗习惯的形成。在科举已离开一个世纪的今天，它的影响仍然依稀可见，那深深的痕迹依然无法完全消弭。

千年科举，早已离去，成为历史的回忆；千载科场的风流人物，也早已被风吹雨打去，变得越来越遥远了。但是，它所留下的一切一切，依然常常勾起人们的遐思。回首昨夜科场星空，欣赏那灿烂的星辰，当为家乡的人杰地灵而自豪；追忆祖先曾经的激动，那执着的追求与顽强的拼搏，不能不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反思昨天的科场风云，人才选拔上的是是非非，更应思索今天的育才与选才。是的，古代科举留下的东西太多，应当而且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迪。

目 录

序.....	刘海峰 (1)
引 言.....	(1)
一、唐五代泉州的科举.....	(1)
唐初泉州科举的空疏.....	(1)
唐代泉州科举意识的成长.....	(10)
唐代泉州科举绩效的初现.....	(18)
五代泉州的科举.....	(34)
唐五代泉州科举的特点.....	(41)
二、宋代泉州的科举.....	(51)
宋代泉州科举兴盛的背景.....	(51)
北宋泉州的科举.....	(60)
南宋泉州的科举.....	(77)
宋代泉州科举的特点.....	(90)
三、元代泉州的科举.....	(100)
元代泉州的科举环境.....	(100)
元代泉州的科举概况.....	(108)
元代泉州科举的特点.....	(116)
四、明代泉州的科举.....	(123)
明代泉州科举的背景.....	(123)
明代泉州的举人.....	(130)

明代泉州的进士·····	(144)
明代泉州科举的特点·····	(175)
五、清代泉州的科举·····	(191)
清代泉州的科举环境·····	(191)
清代泉州的秀才·····	(200)
清代泉州的举人·····	(214)
清代泉州的进士·····	(224)
清代泉州科举的特点·····	(241)
六、科举的影响与启示·····	(253)
科举的社会影响·····	(253)
科举的历史启示·····	(279)
 附录一：泉州历代进士名录·····	 (290)
附录二：泉州历代存疑进士名录·····	(313)
附录三：泉州历代文武进士分县统计表·····	(314)
附录四：泉州历代一甲进士名录·····	(315)
参考书目·····	(316)
后 记·····	(319)

唐五代泉州的科举

自隋朝至入唐以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科举制度并没有给泉州社会带来多大影响，它在泉州一直处于冷寂状态。唐代中期，泉州和福建各级地方官员的积极倡导和鼓励，泉州地区整体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经济较为迅速的发展，泉州的科举意识才开始被唤醒，对举业逐渐表现出热情。以欧阳詹为代表的一批泉州优秀学子，打破了泉州科举零的纪录，结束了科举长期空疏的尴尬局面。自中唐至五代，泉州共出了十九个进士，并有一些人举明经。尽管科第数量不是很多，在全国也没有多大影响，但它对当时和后代泉州的举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初泉州科举的空疏

隋文帝开创的科举取士制度，唐王朝建立后不仅予以承袭，且加以进一步扩充。但是，直至唐德宗贞元初年（780年），前后近一百八十年，泉州社会对举业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热情，也没有学子涉足。这种状况的出现，通常认为主要是泉州读书人满足于家乡的“山水禽鱼之乐”，缺乏积极进取精神。这种见解固然不无一定道理，但并非问题的主要所在。泉州科举长期空疏的主要因素在于：文化教育的相对滞后、社会经济的相对落后、社会各界

对科举缺乏信心等。

中唐以前泉州教育的落后

唐代泉州的教育,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在中唐以前一直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这是无可讳言的事实。泉州原是闽越族人的聚居之地,中原汉民入泉之前,闽族和越族人是泉州的土著居民。秦汉时期中原汉人开始进入泉州,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统辖福建,又有部分北方汉族人移居入泉,但文化落后的闽越族人仍是泉州的主要居民。直到这时,聚居在泉州一带的闽越族人的教育活动,尚没有文字记载。西晋末年中原烽火连年,一部分士族和大批劳动人民为逃避战祸,纷纷南迁福建,进入当时较为安定的泉州。史载当时为避“永嘉之乱”,曾有八个族群进入福建,即所谓“八姓入闽”。《泉州府志》云:“永嘉二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林、黄、陈、郑、詹、邱、何、胡是也。”梁朝,汉族移民大量增加,朝廷决定在南安增设南安郡,管理闽南事务。隋至唐初,中原汉人继续入泉。这些入泉的移民逐渐占据了整个泉州地区,同化融合了这一带的闽越遗民,繁衍生息而形成一个经济较为发达的汉人社会,改变了原来较落后原始的闽越社会风貌。徙居泉州的中原移民,有不少是中原的簪缨世胄及地方士绅,曾受过较好的教育,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进入泉州后,带来中原先进的文化教育,对泉州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可以说,中原移民逐渐占据泉州的过程,也是泉州古代教育逐渐兴起的过程。正是在中原移民的带动下,泉州的教育从晋代开始逐渐发展起来,到唐初已在社会上占有一定地位。尤其唐代在立朝之初就较重视教育,从唐高祖至唐高宗初年,先后三次下诏,令州县及乡里设学施教。泉州的地方官吏也闻风而动,采取措施刺激教育,使泉州的教育开始振兴。唐玄宗开元年间(713—